

1906 ~ 1911 年伊朗立宪革命失败原因初探

蒋 真*

内容提要 1906 ~ 1911 年伊朗立宪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也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朗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尽管立宪革命为伊朗带来了宪法，确立了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构建，但最终在国内外因素的干扰下失败，议会被解散。其原因在于伊朗立宪革命联盟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各有利益所需，联盟基础非常脆弱；革命联盟没有组建正规军，缺乏支撑革命的武装力量；民主党派内部在立宪革命的发展方向上存在分歧，导致革命领导集体的分裂，使革命缺乏明确、统一的理论指导；立宪革命越来越偏离宗教阶层的设想，导致乌莱玛走向革命的对立面。立宪本身是为了限制王权，其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规制和争论不能解决伊朗积贫积弱的经济现状，不能改变伊朗政治经济的依附性，更不能阻止西方国家瓜分伊朗的计划。

关键词 伊朗 立宪革命 乌莱玛 恺加王朝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亚非拉地区的殖民侵略，世界各地也掀起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1906 年，饱受困苦的伊朗人民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国王专制运动。从 1906 ~ 1911 年，伊朗立宪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1906 ~ 1908 年的第一议会时期、1908 ~ 1909 年的小专制时期（即国王复辟时期）、1909 ~ 1911 年的第二议会时期。对于这场革命，国内外学者对其认识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场运动，有学者认为它是伊朗的一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因素，尤其是在阿塞拜疆和吉兰地区。而对于革

* 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命的概念,英国学者彼得·卡尔佛特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指出,革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从本质上来看,革命并不是一个易于研究的对象,因为革命是突发的,革命还是秘密的,关于革命早期的、预谋阶段的材料必须事后被拼凑在一起,而且革命是复杂的,即使是最好的观察者也只能看到其中一小部分。^① 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指出,“革命”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对任何现代革命的理解,至关重要,自由理念和一个新开端的体验应当是一致的,而且革命不仅仅是成功的暴动。^② 塞缪尔·P.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以至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融化他们。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③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指出,革命这个术语是要说明一个激烈、突发、通常还带有暴力的社会政权变动,通常政体、法律基础和社会秩序观念都会有变化。^④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力和革命的关系有过精辟的阐述,他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⑤ 历史唯物主义革命理论强调革命的社会历史基础,不抽象地谈论革命的理性和非理性,而是从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探索革命的动因,主张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解释革命的发生学根源。^⑥

笔者认为,伊朗立宪革命在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伊朗历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深受法国大革命和俄国 1905 年革命

① (英)彼得·卡尔佛特《革命与反革命》,张长东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19~25页。

② (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第18~35页。

③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21~222页。

④ Ervand Abrahamian, “The Caus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Ir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0, No. 3, 1979, pp. 381-414.

⑤ 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222页。

⑥ 罗骞《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概念》,《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第65~73页。

的影响，也是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从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它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而且革命领导者是国内的民主党人士，他们深受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思想的影响。第二，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与当时的王朝专制有所不同，革命引入了具有现代理念的宪法，主张建立议会、实行三权分立，限制王权，伊朗人民也开始由“臣民”变为“公民”，被赋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第三，立宪革命中伊朗民众参与程度很高，在国内形成了广泛的革命联盟，参与者既有高级乌莱玛，^①也有世俗的民主人士，还有学生、工人、商人、地主和手工业者等。第四，革命过程伴随着激烈的暴力斗争。其中包括革命联盟成立的穆贾希丁军与国王军队的对抗，还有伊朗部落武装参与议会保卫战等。然而，立宪革命虽然给伊朗带来了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但随着伊朗民主党派内部的分裂、乌莱玛的背叛、国内外武装力量的联合干预，保皇派最终复辟，议会被迫关门，在随后的历史中，伊朗议会也没有真正扮演立宪革命初期预定的政治角色。因此，笔者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本文也力图探究伊朗立宪革命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一 革命联盟基础不够稳固

19 世纪是伊朗经历剧烈变革的时期，各种改革的不断尝试、正在形成的民族认同、社会精英的激烈争论充斥着 19 世纪。在 19 世纪后半期，伊朗逐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政治经济的依附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② 伊朗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国内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大量的工人和农民被迫来到与俄国交界的地区寻找工作，成为“城市起义和政治思想的传输者”。^③ 由于经济的依附性，

① 乌莱玛，意为“有知识的人”，是对伊斯兰宗教学者的总称，泛指宗教学者阶层，尤其是指精通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的宗教学者，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发挥着重要作用。

② Massoud Karshenas, *Oil, 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47.

③ Eric Wolf, "Peasant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in Jack A. Goldstone, ed., *Revolutions: Theoretical,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p. 175.

伊朗政治也越来越不独立，国王在向西方引进器物文明的同时，国家主权也在逐步向西方列强让渡，传统乌莱玛享有的权威无法保障，部分高级官员对政府的亲西方政策也越来越不满。最终 1905 年底鞭打糖商事件成为伊朗立宪革命的导火索，伊朗反国王联盟迅速形成，参与者既有农民、工人，也有学生、知识分子和享有一定威望的高级乌莱玛，还有许多少数族群。^①然而，革命联盟成分的复杂及其各自利益的不同，使得革命基础并不稳固，从而也预示着革命内部的冲突分化将不可避免地贯穿于立宪革命的始终。此外，立宪革命缺乏正规军队支持和统一政党领导，导致革命联盟最终走上分裂，成为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埃尔顿·丹尼尔在《伊朗史》中所说，革命支持者是“来自一群极端折中主义的政府官员、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宗教界不同政见者、教士、批发商、零售商。他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目的，徘徊在真诚的爱国主义和十足的个人利己主义之间，并且经常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立场”。^②

1. 革命联盟成分复杂，各有各的利益考虑

在恺加王朝后期，伊朗农民的境地越来越凄惨。“当波斯被卷入世界市场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商品经济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恺加王朝对其国内农民群众的剥削。一方面，大小地主用尽可能的手段来剥夺农民及村社集体所有权的土地；另一方面，对资金日益增长的需求驱使新兴地主们对农民征收更多的税赋。”^③面对生活的困苦，农民们积极参加立宪革命，尽管他们对宪法和三权分立并不熟悉，但他们认为改变国王时期的国家状况可能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改变。因此，在立宪革命初期中，农民阶级是一个比较活跃的力量，他们拒绝上缴赋税，拒绝履行封建徭役，夺取地主的庄园、粮食和牲口，在伊朗各地展开各种农民运动，在乡村建立农民恩楚明^④，维护农民的权益。然而，三权分立没有给农民带来实质性好处，基

①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0 - 58.

② (美)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第 125 页。

③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1.

④ 恩楚明 (Anjumans) 是伊朗立宪革命时期建立的民选委员会。《选举法》第 9 章曾号召以恩楚明的形式监视议会选举。恩楚明由当地有声望的代表们组成，监督政府公职人员的行为。立宪革命时期，伊朗国内存在大量的恩楚明，在德黑兰有近 200 个，在地方省约有 100 个。

本法也没有保障他们的权利，反而对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设置了财产限制。^① 农民们也经常抱怨遭受土匪困扰，地方政府则以维持并不存在的军队为借口，反过来增加了农民的赋税。尤其是在第二议会时期，金融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掌控议会，农民的利益越来越没有保障，因此农民对革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

在立宪革命中，商人也是最早参与革命的一个群体，他们积极为立宪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希望通过议会立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在立宪革命前，外国公司在伊朗获得了很多特许权。1872年，英籍犹太人路透男爵获得的特许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被许可修建从里海到波斯湾的南北大铁路，获得煤炭、石油、铁矿、铅矿的开采权以及海关的租借权等，租让期为70年。随后，英国人杰拉德·塔尔博特少校获得为期50年的烟草特许权，其中包括生产、销售、出口伊朗境内所有烟草作物的特权。这些特许权使得伊朗本国商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在1891~1892年的烟草抗议运动中，商人作为一个阶级开始登上了伊朗的历史舞台。对此，伊朗学家盖德·吉巴尔、费莱顿·阿达米特及曼苏尔·毛德尔在早期研究伊朗烟草抗议运动时指出，商人阶层而非乌莱玛是独立掀起抗议浪潮并将之引向胜利结局的最大功臣。吉巴尔指出“表面上是乌莱玛发起了废除特许权的1891~1892年的抗议运动，但正是商人阶层在运动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决定了运动的特征及目标”。^② 然而，伊朗商人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伊朗的商人阶级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缺少能在伊朗导致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转型的生产力和愿望”。^③ 而且伊朗商人与宗教势力之间具有传统联系，

① 1906年9月9日批准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选民分为六个等级，分别是王子们和恺加王室成员、乌莱玛和神学院学生、贵族、地主和佃农、商人、行业协会成员。后三类选民参选有财产限制，地主和佃农需要拥有价值1000托曼的财产；商人需要拥有一处建好的营业处；行业协会成员必须隶属于公认的行业协会并拥有一间平均每年都有租金的店铺。选民年龄应在20~70岁，要求拥有一定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有说、读、写波斯语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许多农民的权利，因为立宪革命时期伊朗部分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文盲。

② Gad G. Gilbar, "The Big Merchants and the Pers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1906,"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3, 1976, p. 290.

③ H. Ashraf, "Historical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urgeoisie in Iran," in M. A. Cook, ed.,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08-332.

如社会历史观察家阿哈迈德·阿沙拉夫曾说“数世纪以来，巴扎商人和清真寺是不可分割的双生儿。”^① 随着革命的深入，民主党派与保守宗教势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宗教势力开始倒向保皇派，商人阶级也变得摇摆不定。1908 年 6 月，当国王准备集结部队袭击议会时，一些商人代表开始呼吁，“我相信这是保持中立和避免被牵连的时候，否则我们都会被扣留”。^② 在利益的诱惑下，商人们最终与保守的乌莱玛合作，倒向了保皇派。

宗教阶层在立宪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不是革命真正的领导者，但它推动着立宪革命的产生和发展。如 1905 年底，德黑兰总督下令鞭打不降糖价的商人时，宗教人士塔巴塔巴伊和贝赫巴哈尼带领约 2000 人前往阿卜杜勒·阿齐姆沙圣所避难，要求建立“公正之家”。库姆的乌莱玛也回应称，“为了保护穆斯林的荣誉、财产和生命，必须让这个压迫者和他的属下把手从穆斯林的土地上拿开”。^③ 在发布的教令中，塔巴塔巴伊甚至将恺加王朝比作曾杀害伊玛目侯赛因的倭马亚王朝。然而，宗教阶层尽管在革命的起始阶段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他们对民主、自由和宪法等现代民主政治的概念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希望改变现状，与国王分享权力。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发现革命的发展方向开始偏离了他们预想的轨道。当伊朗民主党人提出要实现政教分离，建立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时，他们意识到其传统权力将被剥夺，因而保守的乌莱玛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此外，还有一些少数族群也积极参加了革命，其中既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亚美尼亚人，他们将“伊朗视为革命的麦加”，积极参与立宪革命。^④ 此外还包括一些少数教派，他们参加革命本身也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希望改变国王专制下的生活状况，因此在革命中积极建立自己的组织，

① Mehdi Moslem, *Factional Politics in Post-Khomeini Ir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201.

② Soheila Torabi Farsani, “Merchants, Their Class Identification Process, and Constitutionalism,”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0, p. 128.

③ Abdol Karim Lahidji, “Constitutionalism and Clerical Authority,” in Said Amir Arjomand, ed.,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Shi’ism*, SUNY Press, 1988, p. 135.

④ Louise Nalbandian, *The Armen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Development of Armenian Political Parties through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173.

如琐罗亚斯德教恩楚明和犹太人恩楚明等纷纷成立。但由于革命中乌莱玛的参与,及其对穆斯林利益的特别关注,使得少数民族的利益并没有受到保护。伊斯法罕的教法学家阿卡·纳贾菲指出,“很有必要促使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甚至伊斯法罕的欧洲人放弃自己的习俗,与穆斯林保持一致”,应要求犹太人签订协议,保证他们“不向穆斯林出售白酒或酒精”,或“不在伊斯法罕 8 英里范围内兜售货物”。^①而且一些立宪主义者本身就是商人,他们利用那些反犹情绪驱逐在伊斯法罕市场上的犹太服装商人。这种不断增长的骚扰,导致很多犹太家庭离开设拉子、伊斯法罕等地,移民国外。

2. 革命联盟没有组建正规军,缺乏支撑革命的中坚力量

在整个立宪革命时期,革命联盟一直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正规军,但都没有成功,从而在面对保皇部队和外国军队的反扑时没有能力来保卫立宪革命的成果。历史学家瓦内萨·马丁提出,在立宪革命中,奇怪的是不管是 1906 年宪法还是补充法都没有提到军队的归属问题,国王仍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议会制度下君主的最高权威。^②在立宪运动时期,革命联盟依靠的是部落武装和被称为“圣战者”的穆贾希丁军,穆贾希丁军是支持革命最重要的武装力量,它是由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德黑兰的分支秘密中央^③建立的。1907 年秋,英国当局估计穆贾希丁军的数量已经超过了 86000 人,穆贾希丁恩楚明网络已经遍布整个国家。正如当时英国人所描述,“目前骚乱的一个特点是秘密社团的发展,在巴库和波斯北部地区有一群信徒,他们发誓将为保护国家利益和毁灭敌人而付出生命……据说,其成员们虽然互相都不认识,但可以以暴力或积极抵抗的形式进行联合行动”。^④穆贾希丁军公开宣布支持议会和宪制,他们自己是宪政

①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78.

② Vanessa Martin, “State, Power and Long-term Trends in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 of 1906 and Its Supplement of 1907,”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3, 2011, p. 473.

③ 1906 年 10 月,总部位于巴库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派遣 3 名中央委员会成员来到伊朗,在大不里士建立了第一个分部即秘密中央。据称,秘密中央控制着大不里士的革命脉搏,与大不里士恩楚明的关系密切,大不里士恩楚明不仅在日常活动中依靠秘密中央,其政治方针政策的制定也依赖秘密中央。秘密中央成立后不久就建立了穆贾希丁军。

④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4.

体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挑战议会有限制的选举权,呼吁“不考虑立场、民族、贫穷或富裕”的选举权,主张为穷人建立公共机构,实行义务教育等。部落武装曾在反对国王复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 1909 年 7 月,巴赫蒂亚尔部落武装和穆贾希丁军组成联军攻占德黑兰,结束了小专制时期。

立宪政府虽然承认这些武装力量在组织围攻大不里士时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也开始认识到这种非正规军的不足。立宪政府曾称,“我们拥有圣战者,他们依靠坚定的信念和爱国主义,从残暴的政府手中夺得权力,整个国家都感激他们。但是他们无法变成士兵,伊朗需要一个依靠新的章程而组织的现代军队,也需要能够对士兵有良好教育的军事学校。圣战者们分散在大街上,会变成国家的威胁”。^①此外,俄国和英国对立宪政府不断施压,俄国政府公开威胁道,如果圣战者没有被解除武装,俄国军队就要来到德黑兰保护俄国的商业机构。1910 年 8 月 4 日,伊朗政府发出 48 小时通牒,要求穆贾希丁军交出武器或者接受死刑。按照协议,穆贾希丁军将武器上缴政府,而政府将对其进行补偿,然而当得知政府既不补偿在战争中没收的武器、也不补偿圣战者的欠薪时,士兵愤怒了。300 多名圣战者成员聚集在萨塔尔汗^②在阿塔贝克公园的住宅,要求他与政府商讨保护他们和保障其利益。1910 年 8 月 7 日,政府包围了萨塔尔汗的住宅并开火。萨塔尔汗被射中腿部导致残疾,30 多名圣战者被杀,大量士兵被投入监狱。历史学家卡斯拉维和马里克扎德认为,“阿塔贝克公园”事件是民主党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而且质疑民主党政府为何没有将圣战者组织成正规军。

3. 革命联盟内部争权夺利、各自为政,缺乏革命凝聚力

由于立宪革命联盟成分复杂,各自利益需求不同,革命联盟内部政治分歧严重,缺乏凝聚力。在立宪革命初期,革命联盟被立宪精英们所掌握,其中包括主张改革的政府官员。萨德·道莱被称为伊朗“国父”,他是 1906 年宪法的首席设计师,曾担任艾因·道莱内阁的外交部部长。但 1907 年夏

^①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0.

^② 在小专制时期(1908 ~ 1909 年),萨塔尔汗在伊朗成立了最高革命委员会,担任总司令,曾带领穆贾希丁军与国王军队在大不里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第二议会时期的开启奠定了基础,因而被誉为伊朗立宪革命的民族英雄。

天，萨德·道莱在议会与国王的冲突中开始保持中立，随后转向支持新首相艾敏·苏尔坦，最终完全站在了国王穆罕默德·阿里的一边。历史学家们将萨德·道莱的转变归结为他与民主党领导人塔基赞德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结果。贝赫巴哈尼和塔巴塔巴伊是温和宗教人士的代表，在革命中与保守派乌莱玛法兹鲁拉·努里保持距离。^①但随着革命的发展，民主人士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使得温和宗教人士开始向国王靠拢，最后走上革命的对立面。

民主党派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伊朗的民主党派主要包括社会民主党组织 (Organization of Social Democrat) 和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社会民主党组织于 1905 年成立于巴库，是由伊朗的商人和工人建立的，他们深受俄国 1905 年革命思想的影响。据估计，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巴库有 6000 多名成员，他们可以自己生产武器。在伊朗立宪革命初期，社会民主党组织秘密与大不里士的革命者取得了联系。1906 年 10 月，社会民主党组织派遣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来到伊朗，帮助革命人士在该地组建分支机构。大不里士的第一个支部被称为“秘密中央”(Markaz-i Ghaibi)。但随着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伊朗境内成员数量的增加，成立伊朗自己的民主党成为部分立宪主义者的目标。1909 年底，伊朗民主党成立。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民主党的政治观点越来越表现出不同，二者开始分道扬镳。社会民主党组织指责其部分成员利用该组织的威望在伊朗搞派别政治，它反对在伊朗成立西方式的政党政治，主张应在伊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宗教人士，进而在伊朗形成民主联盟。1910 年初，社会民主党组织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其机关报中称，“很不幸，现在有些人利用与我们组织的关系玩政党游戏，但在运动的这个阶段，成立政党和一些自私自利的目标对整个国家是极其有害的。因此我们以神圣中心的名义宣布关闭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伊朗的一切分支，包括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穆贾希丁军及其相关组织”。^②

二 民主政党对国家发展道路存在认识分歧

在伊朗立宪革命中，民主党派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但由于伊朗民主

^① Nikki R. Keddie, *Iran: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Frank Cass, 1980, p. 64.

^②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67.

党派的思想来源复杂,如有的受欧洲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有的受到俄国革命和国际共运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在政治主张上也有所不同。部分民主人士提出立宪革命就要改良伊朗的君主制,有人提出革命的目标应当是在伊朗建立西方代议制,还有人主张应在伊朗发起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具体问题上,民主党派内部关于伊朗的工人阶级是否成熟足以领导革命、伊朗的农民阶级是否具有先进性、伊朗的宗教阶级是否值得团结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从而严重削弱了革命联盟的凝聚力。^①这些分歧使立宪革命时期的伊朗缺乏明确、统一的革命理论指导,直接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伊朗民主党的分道扬镳,革命武装穆贾希丁军被解散,给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1. 民主党派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认识有分歧

总部位于巴库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及其在伊朗的分支机构很早就参与了伊朗的立宪革命,是伊朗立宪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但在革命后期,该党关于伊朗立宪革命的发展前途上开始出现分歧,这种分歧导致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分裂。1908年7月19日,在大不里士内战的第一阶段,大不里士社会民主党组织成员阿尔沙维尔·奇朗加良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向他告知即将举行会议讨论伊朗革命运动的政治和理论问题。他指出,伊朗的民主力量同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伊朗工人阶级产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然而,他们在立宪革命的前途是否是实现社会主义时产生分歧。1908年10月16日,社会民主党召开30人扩大会议,会议由塞德拉克主持,瓦苏·哈哈图里安担任秘书,会议上,两个不同的派别提出修改章程的要求,阿尔沙维尔·奇朗加良和瓦苏·哈哈图里安的观点得到28人支持,成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多数派;塞德拉克和维拉姆·皮鲁森的主张仅得到了两个人的支持,成为少数派。在第二次立宪运动期间,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少数派与塔吉赞德一起成立了伊朗民主党。他们在法国草拟了政党章程,认为民主的概念应当比社会民主的概念更好,更容易被伊朗人民接受,提出将“民主”而不是“社会民主”作为民主党的意识形态。

^① Mangol Bayat, “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 an Overview,”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0, pp. 181 – 190.

他们号召年轻人积极加入该组织，主张跨越种族和宗教的民族主义，提出“我们必须创立一个伊朗的民族主义，如果人们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神，对我们来说是不要紧的。在我们的观点上，各个种族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应当只认同一个民族——伊朗民族”。^①

事实上，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伊朗民主党在很多问题上都存在共识。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发展现代教育、进行社会经济改革，都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伊朗工人阶级诞生的必要前提，最终将在伊朗爆发一场社会主义革命。^②但在评估当前立宪革命的目标是否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社会民主党组织认为，伊朗已进入到工业化阶段，国家有了少量的工人阶级和人数较多的工匠阶层，因此伊朗已经拥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而民主党则认为，伊朗只是刚刚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的工人阶级和建立社会民主制度的基础。即使有工人阶级，但建立民主制度的基础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工人进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没有意义，还会压制其他先进分子，把他们推向反动集团。他们认为在伊朗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是必要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抛弃纯粹的社会民主工作，应与其他阶级一起为民主而奋斗，这是一种政治策略问题。^③

表 1 立宪革命前后伊朗工人阶级状况^④

部门	行业	人数 (个)
现代工业 (共 10850 人)	石油工业	6000
	渔业	3000
	工厂	1650
	矿业	200

①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68.

② Mangol Bayat, "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 An Overview,"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0, p. 187.

③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42 - 245.

④ John Foran, "The Concept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a Ke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Qajar Iran (1800 - 1925)," *Iranian Studies*, Vol. 22, No. 2/3, 1989, p. 43.

续表

部门	行业	人数 (个)
服务业 (共 12700 人)	服务员	5000
	搬运工和码头工人	4000
	铁路和公路建筑工人	3300
	印刷工	300
	电工	100
传统工业 (118900 ~ 123900 人)	地毯业	65000
	织布业	20000
	金属制造业	20000
	皮革加工业	3900
	其他手工业	10000 ~ 15000
总计		142450 ~ 147450

2. 对宗教阶级历史作用的认识有分歧

自萨法维王朝以来,宗教阶层在伊朗的历史上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在恺加王朝后期,宗教事务的领导权留给了乌莱玛,作为王朝专制的合作者,乌莱玛阶层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不依附于王朝统治的独立地位。^①什叶派乌莱玛开始不再是国王统治臣民的御用工具,而是与世俗分庭抗礼的重要群体。许多穆智台希德宣称,隐遁伊玛目并未将指引民众的权力交给世俗的统治者,指引民众的责任只属于教界。^②尽管恺加王朝自称是“安拉在大地的影子”,但一些乌莱玛却将其视为安拉统治尘世权力的篡夺者。^③伊朗的民主党派在立宪革命初期对宗教阶层的认识是相一致的,认为宗教阶层是可以团结的力量。事实上,在立宪革命初期,乌莱玛的宗教号召力的确在群众动员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赋予了革命的合法性。但到了革命后期,社会民主党组织和民主党之间对乌莱玛的认识开始出现差异,社会民主党组织认为宗教阶层是可以团结的力量,但以塔吉赞德为首的伊朗

① 金宜欠《伊斯兰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327页。

② Ira M.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72.

③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40 - 41.

民主党人则主张政教分离，认为立宪革命的前途是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制度，因而对伊朗宗教阶层的作用给予了消极的评价。^① 在革命后期，暗杀宗教乌莱玛也成为打击宗教阶层的手段之一，这在伊朗民主党派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

随着革命的发展，地方恩楚明开始取代乌莱玛的作用，当地居民逐步将社会问题和仲裁提交给地方恩楚明而不是乌莱玛，因此宗教阶层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恩楚明看上去拥有很高的名气，但镇上年长的乌莱玛对他们的组织充满了愤怒与敌意，因为这个组织使乌莱玛的重要性降低了。”^② 自 1906 年底起，民主党人士开始了驱逐保守乌莱玛的运动。1906 年 10 月 27 日，在秘密中央的倡议下，新招募的圣战者大张旗鼓地将乌莱玛米尔扎·卡里姆驱逐出大不里士。1907 年 4 月，大不里士的一位农民拒绝向地主缴纳赋税，地主向乌莱玛米尔扎·哈桑控诉这件事。由于米尔扎本人也是一个富裕的地主，因而他批准地方军队干预此事，随后 200 名军人进入村庄，造成一些农民被杀害。这个消息传开后，3000 名穆贾希丁军迅速赶到，驱逐了米尔扎·哈桑。随后，拉什特的乌莱玛穆拉·穆罕默德·库玛米也遭到驱逐。与此同时，许多保守的乌莱玛拒绝参加恩楚明的会议，开始到处避难。保守乌莱玛的避难引起革命主义者的激烈反对，数千名恩楚明的支持者冲击避难处，撕毁帐篷。革命者马利克·穆提卡利米发表了激进的演说，指责宗教宪制的支持者比革命前期的独裁者更危险，“因为他们想在宗教和沙里亚法的掩护下复活专制独裁……他们以宗教宪制的名义挑战自由和正义……他们正在向全世界证明伊朗不配拥有自由。这些人应当保留在暴虐和专制政府的束缚下，他们应当去死，并被永远打上奴隶的烙印”。^③ 虽然在立宪革命时期，许多温和的乌莱玛与激进宗教人士

① Mangol Bayat, “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 An Overview,”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0, pp. 188 – 190.

②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91.

③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0.

保持着距离，宣称“独裁在伊斯兰教中不具有合法性”。^①但到了立宪革命后期，伊朗民主党人开始用恐怖活动来加强对宗教势力的打压。1910年，乌莱玛贝赫巴哈尼被暗杀，此人曾是立宪革命最初的领导者，因而暗杀事件引起伊朗民众极大的愤怒，抗议活动接连发生。伊朗民主党领导人塔基赞德被怀疑是背后主谋，因而被流放。而政治谋杀是否可以作为革命手段在民主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理论争论。民主党人哈克比安警告说，在人们心中恐怖分子与谋杀者逐渐成为同义词，政治恐怖主义导致人们对革命性观点的不认同，也会使得革命组织失去人们的支持与同情，这对任何一个革命组织来说都是致命的。

3. 对伊朗农民阶级的现状与历史作用认识有分歧

伊朗的农民阶级为立宪革命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农民阶级在自己需求上感到迷惑和自相矛盾，尽管农民阶级在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目标上不知所从，但是在立宪革命中，农民阶级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因素”。^②他们配合反国王运动，在农村地区积极进行土地革命。在大不里士地区，农民建立了乡村恩楚明，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增加了立宪革命的民主色彩。约翰·密尔在《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中指出，“乡镇自由并非人类设计的产物，因此它很少被创造出来，而似乎是自发的产物，在半野蛮的社会状态中几乎是悄然地发展起来。然而，正是在乡镇中蕴涵着一个自由民族的力量”。^③但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出现了问题。地主们抱怨“吉兰的农民认为宪政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自由和不缴纳税，因为这个原因，这一地区的农民已经暴动并拒绝缴纳税，所有的村庄都陷入了混乱”。1907年5月，阿塞拜疆地区的农民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活动，拒绝承认地主的传统权力。1907年8月，阿塞拜疆地区农民的不满逐渐蔓延，不仅农民驱逐地主和监工，而且被指派镇压起义的政府军队也不听从指挥官的命令，因为许多士兵本身就来自于农民。在第二议

① Homa Katouzian, "The Revolution for Law: A Chro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Ira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7, No. 5, 2011, p. 772.

② Raya Dunayevskaya, *Rosa Luxemburg, Women's Liberation, and Marx's Philosophy of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pp. 11-12.

③ [英] 约翰·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16页。

会期间，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势力开始上升，要求解散乡村恩楚明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由于民主党没有保护乡村恩楚明，导致其最终被解散。也因此有历史学家指出，立宪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民主党派在革命后期忽视了农民阶级的力量。

塔吉赞德作为伊朗民主党的领导人，他推崇资本主义民主，试图与参加抵抗运动的工人、工匠和农民保持一定距离。他认为，要推动伊朗立宪革命运动的发展需要与伊朗的知识分子结盟，而不是与农民和工匠结盟。对于伊朗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差别，塔吉赞德指出，“许多理想和完美的理论是产生像法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的国家，法国正是文明的起源，既美丽又有‘教养’，奥斯曼帝国也是沿着欧洲的道路，训练出了百万军队。相比之下，伊朗革命又诞生在一个怎样的国家？1/3的人口还是部落民众，未开化的人和盗贼，那些穆贾希丁军的品质我都羞于说出口”。^① 在立宪革命后期，塔吉赞德对革命评价很低。他认为革命没有给人民大众带来受教育的机会，在革命后的几年里，伊朗的处境没有变化，无论人民愿意做出任何牺牲，他们仅仅是一群盗贼和自私自利的人。

三 乌莱玛阶层后期态度出现转变

自萨法维王朝以来，什叶派成为伊朗国教，宗教阶层在伊朗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国王与乌莱玛之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平衡关系。到了恺加王朝时期，乌莱玛阶层越来越多的成为各种司法、社会和商业案件的仲裁者，而恺加王朝的中央集权并不强大。^② 随着伊朗国家主权向西方列强的让渡和恺加王朝后期的腐败，宗教阶层的不满日益增加，乌莱玛参与社会运动的积极性高涨。在 1891 ~ 1892 年的烟草抗议运动中，虽然有学者认为，“商人阶层巧妙地运用了乌莱玛的宗教影响力，为其实际上的世俗

^①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50 - 251.

^② Hamid Algar, "Religious Forces in Eighteenth-and Nineteenth-Century Iran," in Peter Avery, Gavin Hambly and C. P. Melville,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716.

化及反帝国主义服务”^①，但乌莱玛在这场运动中担任了实际上的领导者角色。这种抗议模式被认为是乌莱玛与改革者之间的联盟，因为“只有乌莱玛能够发起一场成功的群众性运动，当社会广泛缺乏对现代化的需求时，诉诸宗教话语来调动群众积极性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② 在立宪革命初期，乌莱玛对伊斯兰传统文明的召唤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引进，赋予了革命的合法性，从而使宗教阶层与世俗精英的结盟也成为可能。^③ 但随着改革的推进，立宪革命越来越偏离了乌莱玛预想的方向，开始威胁到宗教阶层的利益，因此他们很快走上了革命的对立面。其中国王对宗教势力和民主派别之间的离间加剧了革命联盟内部的破裂。因此，有学者认为，对现代革命的研究表明，传统宗教领导人与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进攻一个君王的专制统治，这种联盟必然是短命的。^④

1. 乌莱玛阶层参加革命目的是分权，而不是真正建立民主政治

乌莱玛阶层在伊朗的近现代史上一直比较活跃，尤其是在萨法维王朝时期，他们与国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分享着君主专制赋予的宗教权威。为维护萨法维王朝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萨法维人除了自称是先知后裔外，还积极与宗教阶层合作，从而使什叶派在该时期被国王确立了伊朗国教的地位。伊斯兰教什叶派的教义理论得到发展，形成独特的教阶制度和效法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乌莱玛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号召力。在萨法维时期，卡拉奇发展了作为隐遁伊玛目代理人的观点。他提出，伊玛目已经指定乌莱玛为自己的代理人，因此没有必要再另行指定他人来代行伊玛目的权威。卡拉奇的外孙米尔·达马德对乌莱玛权威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说“正义的统治者是不谬的伊玛目，或是伊玛目指定的人，或是有资格代替伊玛目行事的人。”到了 17 世纪，伊玛目的圣训开始出现，印证着教法学家政体

① Mansoor Moaddel, “Shi 1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Class Mobilization in the Tobacco Movement of 1890 – 1892,” *Sociological Forum*, Vol. 7, No. 3, 1992, p. 459.

② Nikki R. Keddie, *Religion and Rebellion in Iran: The Tobacco Protest of 1891 – 1892*, London: Frank Cass, 1980, p. 15.

③ Mangol Bayat, “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 An Overview,”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0, p. 170.

④ 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159 – 160.

权威的合法性，据传，伊玛目曾说“我是真主给你们的证据，他们（教法学家）是我给你们的证据。”^① 随着宗教势力的发展，到了恺加王朝后期，乌莱玛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1825年，伊朗与俄国因边境划分不清发生冲突，乌莱玛向国王施加压力，要求对俄宣战，乌莱玛宣称他们将发布教令宣布圣战，不遵照教令行事将被视为对信仰的背叛。因此有学者称，在19世纪后期，乌莱玛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不仅是国家政权的保护者，而且在反对西方列强和腐朽君主制的斗争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伊朗民族主义的形成，为伊朗民族主义的发展定下了宗教的基调。^② 在19世纪后期，随着外国投资的大量进入，乌莱玛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害，外来投资带来的文化冲击，也危及乌莱玛的传统影响力。为改变这一状况，乌莱玛阶层希望通过参与立宪革命来分享国王权力、重拾往日权威。而立宪革命正是打着建立议会、限制王权的口号，从而在目的上与乌莱玛的利益一致，这也是乌莱玛积极参与革命的重要原因。但随着革命的深入，立宪革命开始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提倡现代教育、倡导政教分离等，这与乌莱玛预想的目标并不一致，因此宗教阶层走上革命的对立面是不可避免的。

2. 立宪革命初期已经表现出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矛盾与冲突

立宪革命是学习西方制度文明的结果，在理论上与宗教权力存在竞争关系，这也必然导致宗教阶层与世俗革命者的分化。立宪革命要求颁布宪法以及将国家立法权归于议会，从而独立于国王的专制权力。但对乌莱玛来说，一切权力源于真主，最高立法权属于真主，而真主的代表是伊玛目，伊玛目的继承人是乌莱玛，以此推演，最高立法权在实践上应该归属于乌莱玛，因此颁布宪法本身与乌莱玛的权威是相矛盾的。在立宪革命中，虽然乌莱玛积极参与了革命运动，并在革命初期的关键时期呼吁民众积极参与革命，但他们并不是实际的领导人。随着革命的推进，民主党派成为革命的领导中坚，在草拟宪法的过程中，世俗力量与宗教阶层发生分歧。在争论与分歧中，1906年12月30日，国王批准了基本法草案，对议会的权

^① Said Amir Arjomand, *The Shadow of God and the Hidden Im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142 - 143.

^② 吴云贵、周燮藩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39 - 246页。

利和义务进行了规定。但随着民主党派在议会中的势力增强，他们开始提出新的主张，如人人平等、人民主权、言论自由等，这是传统乌莱玛所不能接受的。1907 年春，革命联盟出现分裂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为了弥合革命联盟的分歧，民主党派与乌莱玛达成了妥协。1907 年 10 月 7 日，国王批准了基本法补充条款，补充法首先明确指出伊斯兰教什叶派是伊朗的国教，伊朗国王必须信仰该宗教。同时规定，组建由 5 名高级宗教人士组成的委员会，议会通过的所有法案必须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这被称为“赋予了宗教阶层史无前例的权力来干预立法，从而摧毁着议会和司法的权威”。这种分歧虽然通过补充法的相互妥协得以缓解，但民主党人主张的世俗权力与乌莱玛权威这种分歧与矛盾是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最终将不可避免产生冲突。

3. 立宪革命后期民主党政教分离的主张，使得宗教阶层彻底倒向保皇派

当初乌莱玛加入立宪运动一方面希望与国王分权；另一方面希望引导运动朝着宗教方向发展，至少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宗教阶层的利益。随着立宪革命的深入发展，乌莱玛越来越发现革命朝着背离他们期待的方向运动，因此传统乌莱玛和温和乌莱玛都纷纷起来反对。为此，保守的宗教领袖努里多次组织宗教避难。在德黑兰郊外避难时，努里的追随者达到 1000 多人，其中有 18 个乌莱玛，30 个中级宗教人士，50 个传教者和毛拉，300 名神学院学生，200 名店主，100 个仆人和超过 200 个因为免费的食物而加入的成员。^① 在保皇派的支持下，努里指责立宪主义者的非穆斯林性质，他提出要结束避难需要满足他三个条件：1. 所有议会代表都要是虔诚的穆斯林，不能选举宗教异见人士或非穆斯林进入议会；2. 宪法不能在任何地方与沙里亚法有冲突。“自由在伊斯兰中是异端，”出版自由的规定必须从宪法和补充法中去除；3. 波斯神教和其他“异教徒”教士应当被禁止设坛讲法。^② 事实上，在民主党派与传统保守乌莱玛的政治斗争中，温和派的乌莱玛并没有加入，而是作为中间调停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在革命初期维护立宪革

①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0.

②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0 - 111.

命合法性上做出了重要贡献。^①但随着革命后期民主党明确提出伊朗立宪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建立西方式的、政教分离的民主政治时，温和派的乌莱玛阶层与民主革命人士的距离越来越远。温和派的乌莱玛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 1910 年乌莱玛贝赫巴哈尼被枪杀，从而彻底结束了宗教温和势力与民主党派的联盟，使得整个宗教阶层倒向了皇室。

四 立宪本身不能解决民族困境

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伊朗政治经济的依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伊朗王朝的专制统治越来越腐朽，国王向西方国家大量举债，并以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来赔偿，使伊朗在 20 世纪初期前后的民族困境越来越严重，伊朗在某种程度上已沦为英俄两国的殖民地。^②对于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伊朗而言，其依附性特征导致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民生活困苦，社会不满情绪越来越多，而主权的部分让渡使得外国势力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参与更加广泛，瓜分伊朗的协议在列强中酝酿。然而，立宪革命的产生虽然是由上述因素导致，但是立宪本身是为了限制王权，通过颁布宪法和成立议会来增加公民的政治参与度，它对国家权力结构的规制和争论不能解决伊朗积贫积弱的经济现状，不能改变伊朗政治经济的依附性，更不能阻止西方国家瓜分伊朗的计划，反而引来外国势力对伊朗立宪革命的直接干预与扼杀。而且伊朗立宪革命并不是伊朗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转型过程出现的革命诉求，“立宪革命所涉及的政治变革并不是来源于国家内部社会经济的转型”，^③伊朗民主党的资本主义政治主张也来自于两大敌对势力——英国和俄国。^④历史学家卡姆兰·马丁指出，伊朗立宪革命的爆发是其“国内两种

① Mangol Bayat, “The Rowshanfekr in the Constitutional Period: An Overview,”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0, pp. 167 – 172.

② 李春放 《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 299 页。

③ Homa Katouzi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Iran: Despotism and Pseudo-Modernism, 1926 – 1979*,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54.

④ John Foran, “The Concept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a Ke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Qajar Iran (1800 – 1925),” *Iranian Studies*, Vol. 22, No. 2/3, 1989, p. 57.

紧张力量矛盾的一种爆发，这两种力量是现代性和前现代性，或者说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卡姆兰认为，立宪革命失败的原因是革命的领导者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提出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主张，导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匹配，这与巴列维王朝在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基础之上进行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一样，最终只能导致失败。^①

1. 立宪本身不能改变伊朗积贫积弱的现状

19 世纪以来，伊朗与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开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自由贸易对高度发展的工业国有益，对相对不发达的国家有害，不平等的经济交往使一方受益，而使另一方受害。在 19 世纪后半期，伊朗经济的依附性特征越来越明显，纺织品等手工艺制品的出口锐减，而在鸦片、稻米、棉花、烟草、坚果、羊毛和干果等原材料的出口明显上升。1857 年，伊朗总出口量的 27% 为棉、毛和丝织品，而 1911 年同类产品仅占总出口量的 1%。1875 年，布什尔的一位英国人乔治·卢卡斯写到“几年前（1868~1869 年），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已吸引了波斯人的眼球，那些亚兹德、伊斯法罕以及其他地区几乎可以利用的土地全部都将谷物和其他农作物改种为鸦片……人们试图通过种植有利润的经济作物来发家，但却忽视了提供生活必需品（如谷物），加之干旱和其他环境条件导致了 1871~1872 年的饥荒。”^②

表 2 1857~1913 年伊朗进出口情况^③

年份	年均、英镑			
	进口	出口	贸易总额	贸易平衡
1857	2992857	3000000	5992857	+7143
1868	2500000	1500000	4000000	-1000000
1875~1877	2264151	2264151	4528302	0
1877~1880	2264151	1509434	3773585	-754717

① Kamran Matin, “Democracy without Capitalism: Rethorizing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1, No. 1, 2012, pp. 52–53.

②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

③ John Foran, “The Concept of Dependent Development as a Key t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Qajar Iran (1800–1925),” *Iranian Studies*, Vol. 22, No. 2/3, 1989, p. 17.

续表

年份	进口	出口	贸易总额	贸易平衡
1880 ~ 1885	4390224	3484321	7874545	- 905903
1885 ~ 1890	4264706	2941176	7205882	- 1323530
1890 ~ 1895	3793103	2709370	6502473	- 1083733
1895 ~ 1900	4965243	2482622	7447865	- 2482621
1901 ~ 1905	5872833	3913087	9785920	- 1959746
1906 ~ 1910	8052302	6561814	14614116	- 1490488
1911 ~ 1913	10727463	7890345	18617808	- 2837118

为改变伊朗的经济结构，在立宪革命时期，伊朗民主党曾经提出过包括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在内的马什哈德计划。民主党人提出，要将伊朗落后的封建经济改变成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废除许多传统的农民义务，禁止地主进行强制劳动和附加服务的要求，并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建立仲裁机构。^①然而，在整个立宪革命时期，伊朗国内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权力斗争，尤其是保皇派与立宪派之间的斗争和民主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民主党并没有把社会经济改革提到日程上，而且由于民主党内部观点不统一，革命的前途是朝着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尚不明确，这种笼统和没有政治权威与稳定做保障的经济改革自然是海市蜃楼，不可能改变伊朗积贫积弱的现状。

2. 立宪本身不能维护国家主权和解决民族独立问题

伊朗的立宪革命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列强为争权夺利加强了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多的小国弱国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积贫积弱的伊朗自然也被包括在内。1813年10月，伊朗与俄国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古利斯坦条约》，该条约要求伊朗放弃对格鲁吉亚、达戈斯坦、明格里和阿伯哈基等地的主权要求，并剥夺了伊朗在里海的航行权。作为回报，俄国承诺正式承认阿巴斯·米尔扎在伊朗的摄政地位，并答应帮助其登上王位。1814年，伊朗与英国签订了第二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德黑兰条约》，条约规定，伊朗不得让与英国交战的国家借道伊

^①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70 - 271.

朗进入印度；伊朗与俄国的最后边界线须在英国外交代表的参与下划定等。19 世纪后期，伊朗与俄国和英国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根据条约，伊朗将允许俄国和英国政府在其境内随意设立领事机构和商务机构，两国商人在伊朗境内享有贸易特权和司法豁免权。^① 1904 年，俄国政府明确表示，其目标是在政治上使伊朗顺从，在经济上控制伊朗的市场份额，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俄国在伊朗的利益。^② 尽管此时伊朗民族主义正在形成，各种不同的分歧被民族认同所统一。但在这种情况下，单凭立宪是不可能解决伊朗的主权独立问题。从立宪革命的整个过程来看，革命的主要任务仍是与国王以及保皇派之间的斗争，在斗争中，国王与保皇派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不可能维护国家主权反而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来换取王位，而西方列强正好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瓜分。

1907 年 8 月 31 日，英国和俄国为了对抗德国，结成联盟，签订了声名狼藉的《英俄条约》，作为双方恢复友好关系的一部分。该协议保证“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但继续把这个国家划分为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在北部地区，沿着席林堡经亚兹德到俄国与阿富汗和伊朗边界的交叉点一线以北地区。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在南部，沿着自阿富汗边界到阿巴斯港一线以南。双方将分享伊朗政府的海关、邮政和电报业务收入，以确保其可以偿还英俄银行现有的贷款。由于英国还控制着波斯湾地区（而且还计划在伊朗西南部地区扶持一个傀儡政权），这就使立宪政府实际上所能控制的不过是中央沙漠盆地。^③ 1910 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访问德国，与德皇威廉二世举行谈判。1911 年 8 月 19 日，双方签署了《波茨坦协定》。根据该协定，德国政府正式承认 1907 年协定中有关伊朗北部诸省属于俄国势力范围的规定；俄国政府则答应帮助德国人取得在英国势力范围内修筑哈纳根到霍拉姆沙赫尔铁路的租借权，以使正在修筑的柏林—伊斯坦布尔—巴格达的铁路能延伸到波斯湾。双方还约定，假若俄国政府在两年内仍不能开始修筑德黑兰—哈纳根铁路的话，德国就将要求取

① Ervand Abrahamian, *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51.

② John Foran, *Fragile Resistanc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p. 110 - 112.

③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伊朗史》，李铁匠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第 128 页。

得修建该铁路的租让权，以便确保德黑兰—巴格达铁路修建工程的按期完成。^① 上述协定引起伊朗国民和议会代表的愤怒与抗议，但由于当时议会正忙于与保皇派的斗争，伊朗未能以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种挑战。

3. 立宪不能阻挡外来势力的军事干预

自 19 世纪初以来，恺加王朝一直希望按照欧洲模式来构建现代化的武装部队，伊朗政府曾经邀请过法国、英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军事代表团来帮助伊朗实现国防现代化，但都没有成功。伊朗实行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仅仅被认为是“给国王的军队涂上现代化的色彩，满足国王对军服的爱好，采用这种方式还可以使国家的钱流入精英家族的口袋”。^② 1879 年，第一支沙俄军事代表团来到伊朗，它是伊朗雇用外国军官尝试的转折点，也对伊朗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有学者认为，“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对沙俄非常怀疑，以至于不能允许沙俄军官训练伊朗军队，如今沙俄军事代表团和哥萨克骑兵旅的存在似乎标志着伊朗越来越虚弱，皇室越来越腐败堕落”。^③ 因为沙俄通过派遣大量军事指挥官控制伊朗的哥萨克骑兵旅，维护沙俄在伊朗的利益。尽管伊朗籍军官曾成立过伊朗军事委员会，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

在立宪革命时期，民主党人也曾积极提出要建立正规军的要求，不再依靠圣战者和部落武装，但一直没有成功。1910 年，伊朗立宪政府决定向中立国家聘请一批顾问和专家。摩根·舒斯特等五名美国人被聘为国库和财政部门顾问，法国人阿多夫佩尼被聘为司法部门顾问，雅尔马松上校等瑞典军官被聘为军事顾问。舒斯特为了征收各项捐税组建了专门的宪兵队，英国驻德黑兰前武官斯托克斯上校担任队长，引起俄国不满。1911 年 11 月初，俄国派遣 5000 名俄军进入伊朗境内。11 月 11 日，俄国公使向伊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 48 小时内向俄国政府做出解释，而英国对此采取

① (伊朗) 阿卜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 《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278 页。

② Stephanie Croni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and State-Building in Iran,”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I. B. Tauris, 2010, p. 92.

③ Stephanie Croni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and State-Building in Iran,” in H. E. Chehabi and Vanessa Martin, eds.,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Popular Politics,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I. B. Tauris, 2010, pp. 90–94.

默许态度。11 月 29 日,俄国政府再次向伊朗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舒斯特必须在 48 小时内离开伊朗;伊朗政府必须保证今后没有俄英两国政府的同意,决不聘请任何外国顾问;同时要求赔偿俄国向伊朗调遣军队的费用。^①虽然俄国的通牒在伊朗国内引起大规模群众抗议,但伊朗政府却最终妥协。1911 年 12 月 24 日,伊朗政府正式接受了俄国的最后通牒,将舒斯特驱逐出伊朗,解散了议会。

结 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之中,大国国内出现种种革命迹象,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这些运动及理论思想为伊朗的民族解放运动带来了生机,为立宪革命提供了榜样和理论指导。英国驻德黑兰公使沃尔特·A. 斯特说“1905 年,俄国革命对伊朗有一种令人震撼的影响。俄国发生的事情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那种新的精神似乎已经影响到了整个民族,波斯人对他们的统治者感到厌倦,并开始考虑他们有可能建立一种模式更好的政府。”^②与此同时,伊朗很多知识分子曾在欧洲留学或游历多年,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非常推崇。在立宪革命运动中,担任领导者的正是这些深受外来革命思想影响的伊朗人。然而,由于立宪革命联盟的参与者成分复杂,各有利益所需,联盟基础非常脆弱。在革命初期起到重要作用的乌莱玛阶层,社会政治的危机使得宗教阶层的作用凸显,但宗教意识形态的发展又使世俗和宗教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乌莱玛为维护自身的传统利益而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在立宪革命中后期,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伊朗民主党对立宪革命的发展方向和伊朗政治前途存在深层的理论分歧,这种分歧严重削弱了革命领导力量,导致革命领导联盟的破裂。而且立宪本身不能解决民族困境,不能改善伊朗经济和保护国家主权。对于这场革命,彭树智先生在《中东史》一书中指出,“立宪革命使伊朗有了第一部资

① (伊朗)阿卜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 《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元文琪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 281 页。

② Janet Afary, *The 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1906 - 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7.

产阶级性质的宪法，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议会，沉重打击了恺加王朝的君主政体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摇撼了王朝统治的基础”。^① 苏联学者伊凡诺夫在《伊朗现代史概要》中指出，“伊朗革命是20世纪初期紧跟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席卷东方各国的革命浪潮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浪潮所标志着的是东方各国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伊朗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为民族的独立和自主的斗争准备了条件”。^②

[责任编辑: 申玉辉]

① 彭树智主编《中东史》，人民出版社，2010，第257页。

② 〔苏〕伊凡诺夫等《伊朗现代史概要》，文津、孙伟、张芹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21页。

Keywords: Egypt; Israel; Egypt-Israel Peace; Anwar al-Sadat; Begin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1906 – 1911

Jiang Zhen

Abstract: 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1906 – 1911, as a part of wave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in Asia-Africa-Latin American area, is a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which mad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Iran's history. Although the revolution brought the first constitu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political framework of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the parliament closed under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Causes of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lay in the complexity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had their own interests, the absence of the formal military, the divergenc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ies and the betrayal of Ulama. What's more, nationalism aiming at the restriction of the emperor could not change Ira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couldn't prevent Western's plan to divide up Iran.

Keywords: Ir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Ulama; Qajar Dynasty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Dilemma in Contemporary Libya

Li Xiaojuan

Abstrac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Libya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Kingdom of Libya, Gaddafi and Post-Gaddafi era. The form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edicaments in each stage are different. The United Kingdom of Libya was founded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long period of foreign rule and geographical division led to the lack of cohesion i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Libya,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royal power was charac-